

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 4

ACADEMY TRANSLATION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IN CHINESE
STUDIES NO. 4

XING Wen, General Editor

原道

《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

[美] 罗浩 (Harold D. Roth) 著

邢文 主编

学苑出版社

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
4

ACADEMY TRANSLATION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IN CHINESE
STUDIES NO. 4

XING Wen, General Editor

邢文 主编

原道

《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的基础

【美】罗浩(Harold D. Roth) 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道:《内业》与道家神秘主义基础/[美]罗浩著;邢文主编.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 1

(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

ISBN 978 - 7 - 5077 - 3053 - 1

I. 原… II. ①罗…②邢… III. ①管子—研究②道家—研究
IV. B226. 15 B223.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4889 号

责任编辑:战葆红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www. book001. 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 bta. net. 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北京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尺寸: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中译本序

我们北美有句俗话：“传统死而不亡”^①——我们只有三四个世纪的传统可以担忧！中国的传统历久弥深——中国有更多的历史需要超越。

在中国 2000 年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传统文人以及他们在近世的西方学生，始终坚持着关于道家传统的一种特定的观点：道家传统是由公元前 6 世纪、历史上的一位名叫老聃（老子）的真实人物所创立的；据传他是道家的奠基之作《道德经》的作者。根据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老子及其主要弟子庄子、列子、文子，共同构成了道家哲学的学派。这一学派与后世带有迷信色彩的道教根本不同，虽然两者名称相同^②、共用了部分宇宙论的思想、拥有相同的创始人。如果这些信念是真实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种宗教如此严重地偏离了它的思想基础。

从 1973 年公布马王堆考古发现开始，30 多年来中国的考古发现使我们逐渐认识到，关于道家发展的传统描绘，可以被认为是过

① 译注：此语的英文是：Tradition dies hard。罗浩教授藉此语说明：传统的思维与理解方式难于改变。“死而不亡”，语出《老子》。老子《道德经》第 33 章：“死而不亡者寿也。”

② 译注：在中文中，“道家”与“道教”是两个词，但在英文中，两者是同一个词：Daoism 或 Taoism，所以，作者说“两者名称相同”。

于简单化了,言重一点,甚至是错误的。中国道家是通过一些没有严格组织的师生,按照现存最早的古书,习练相同的静修功法而兴起的。这种修炼我称之为“inner cultivation”,即“内修”,其内容见于本书所翻译、分析的《内业》。长期以来,《内业》是作为与齐国及所谓“稷下学派”相关联的《管子》中的一篇,得以流传的。

在本书中你会看到,《内业》是比《老子》还要早的作品。《内业》是含有人定静修这种功法的现存最古老的见证,而这种功法也是见于《老子》、《庄子》、《淮南子》等所有道家经典的宇宙论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这种形式的自我静修仍然是道家传统的支柱之一;我们可以在几百年来道家与道教的主要流派与活动中,找到这种功法的不同形式的证据。如果道家哲学中也有儒家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贯”(《论语·里仁》),那么,它就是本书所详述的内在修炼的功法。

在本书首次出版至今的十年间,西方学术界的观点已经坚定地转向本书所涉及的广泛议题中的某些方面:道家与道教是一个大体上连续和统一的传统;早期道家的哲学文献和后世道教的宗教表述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沟壑。有的学者甚至进而认为,“Daoism”(道家与道教)直至汉末的千禧年主义运动时才真正存在。^①然而,我上文提到的传统观点,仍然在中国和东亚的学术界顽强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由于我的朋友和同事、达慕思大学的邢文教授,以及他的合作人

^① 译注:“千禧年主义运动”(millenarian movements)的说法,来自西方某些基督教教派的信仰。他们相信将来会有一个黄金时代,基督会统治世界;千禧年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世界的末日,而是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最后一个时代。在这里,作者把汉末道教的兴起,早期道教领袖伪托天神降福济民的活动,比作千禧年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的陶磊教授、南京学者严明、三一大学何金俐教授、原香港岭南大学谷明晔诸位的出色奉献,本书现在可为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的学者们所利用。对此我深为感谢。我希望本书能够在把中国学术界的目光,引向审视这一在中国延续了近 2500 年的、伟大的道家传统的连续性的新的研究途径方面,产生一些小小的影响。

罗浩(Harold D. Roth)

2008 年 8 月 1 日

鸣 谢

本书反映了我 15 年以来所积累的有关早期道家思想的起源与本质的思考,包括了近 10 年来从不同角度对它们进行考察的文字,探讨它们应该如何被系统化地、批判性地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这些年来我在课题的引导下渐入佳境,研究所得为掇拾的一些并不完美的思绪,其中包括了支持我的朋友与同事们的意见。

1983 年 8 月在多伦多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会上,黎惠伦(Whalen Lai)撰写的一篇论文,最早引起了我对《内业》、《心术》诸篇的注意。此后,我获得了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委员会的一笔资助,因而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师从葛瑞汉(Augus Graham)通读这些文献。那一年是葛瑞汉在亚非学院的最后一年。这个机会使我能与这位杰出的学者建立了友谊。许多夜晚,我们就内容广泛的问题进行交谈,从《庄子》错综复杂的思想,谈到阴谋论乃至人体的自燃。当时在亚非学院,还有几位难得的志同道合的学者,包括我的朋友谭朴森(Paul Thompson)和艾兰(Sarah Allan)。我无法感谢这三位友人所教给我的中国古代思想的知识,以及他们的学识与对我的支持。

执鞭布朗大学以后,葛瑞汉曾于 1988 年来作访问教授,我得以继续与他共事。我也捡起了自己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开始的两个兴趣。关于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自我修炼问题,我感谢杜维明与

牟复礼(Fritz Mote)两位对我最初的指导,也感谢乔克·瑞德(Jock Reeder)有关神秘体验本质的严格考察方法的初步指导。在布朗大学,我继续研究这些课题,而有关神秘体验的考察问题又获益于与巴尼·蜕思(Barney Twiss)的合作。这些年来,我们一起开设了有关比较神秘主义的不同方面的一系列课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常常就着一两杯啤酒,展开很多很投入的、很有益的讨论——这是我在亚非学院时我的英国朋友们介绍给我的快乐。

我对这些题目的思考渐有心得。下面几个关键的机会,使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想法并聆听别人的回应。第一位邀请我的是罗伯特·巴思威(Robert Buswell),他邀请我出席1988年2月在南加州大学举行的“南加州中国论坛”。会上,我得到了麦克·斯缀克曼(Michel Strickmann)的特别支持与鼓励。一个月之后,叶山(Robin Yates)和包弼德(Peter bol)邀请我出席在哈佛举行的“古代中国研讨会”,在那里我得到了包括史华慈(Ben Schwartz)在内的更多学者的鼓励。同年晚些时候,罗叟·柯克兰(Russell Kirkland)邀请我在美国宗教学会年会的一个小组就中国古代宗教问题发言,韩禄伯(Robert Henricks)对我的观点给予了许多珍贵的反馈。此后几篇重要论文的撰写,是出于如下的邀请:苏德恺(Kidder Smith)与我们1989年的新英格兰中国思想研讨会、苏珊·切诺克(Susan Cherniak)与1994年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山田利晃(Toshiaki Yamada)与孔丽维(Livia Kohn)1995年在东京举办的首届美日道教文化研讨会、维克多·霍瑞(Victor Hori)1996年在麦基尔大学与陈鼓应1996年在北京举行的国际道教文化研讨会、顾史考(Scott Cook)与1997年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金鹏程(Paul Gold-in)199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古代中国学术传派研讨会以及2007年卡尔·比乐费德(Carl Bilefeldt)在斯坦福的会议。所有这

些邀请为我提供了从古代道家思想的不同角度去思考与写作、去听取回应与挑战的机会,从而鞭策我继续前进。

这些年来,我的研究尤其受到了几位与我来往较密切的同事的大力支持。他们阅读、评论了我的大部分的文字,帮我理清那些总是不能完美地表达我的想法的思路。对此,我深为感谢。他们是桂思卓(Sarah Queen)、马绛(John Major)和麦安迪(Andy Meyer)。在我最怀疑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帮助与鼓励给了我继续向前的力量。我同时希望在此感谢另外几位同事,他们对于其他几个与本书相关课题的精辟见解,最终影响了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的定稿。他们是安乐哲(Roger Ames)、布鲁姆(Irene Bloom)、鲍则岳(Bill Boltz)、罗思文(Henry Rosemont Jr.)和叶山。

通常,一个人所处的教学环境会对他的学术成就有很深的影响。这也充分地体现在我身上。我在布朗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同事对我神秘主义的比较分析不但给予了帮助和支持,而且对我学习形式考证、编纂考证、作品考证与叙述考证的文献学方法,^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① 译注:罗浩教授在这里提及的西方文献学的方法,均与圣经的文献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形式考证(form criticism)或曰形式文献学,与编纂考证(redaction criticism)或曰编纂文献学,是20世纪发展出的福音书文献学的两大学派,与传统考证(tradition criticism)或曰传统文献学、文学考证(literary criticism)或曰文学文献学,共同构成福音书文献学的四大分支或曰四大学派。形式考证在假定福音书的作者仅仅是“剪刀加浆糊”的编者的基础上,着重考证福音书最终的文献形式的真实文献来源。编纂考证从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角度,研究编、著者如何改变文献的来源、弥补文献的缺环,进而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此外,作品考证(composition criticism)或曰作品文献学,只研究作品中现存的文献证据,包括作品的格式与重点等,不研究文献的编纂传统。叙述考证(narrative criticism)或曰叙述文献学,实际上是运用现代文学理论的分析方法,从文本本身的故事、类型与问题出发,对四大福音以及圣经的其他主要部分进行文学阐释,回避文本以外的历史背景。

这些同事里最突出的就是斯坦·斯特思(Stan Stowers),感谢他那富于启发意义的讨论和重要的参考文献。还有,系里以前的研究生安·哈特(Anne Heyrman Hart),曾花费许多时间与我讨论课题中与《新约》研究相关的问题。十分巧合的是,当我开始研究这些重要的文献学的方法的时候,其他几位学者也开始把它们运用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麦克·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白牧之(Bruce Brooks)、白妙之(Taeko Brooks)这些学者,对我试图在古代道家的研究中运用西方文献学的方法都有重要的影响。

当我开始准备著书讨论自己关于古代道家思想的一些新见以及《内业》这部长期被忽视的古籍时,我又从不同的方面得到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支持。在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大学教师奖励基金的资助下,我得以休假一年来从事研究。另外,在五年的时间里,我的研究与会议经费始终能够得到布朗大学一位出色的大学主管——主管教学的前院长布莱恩·谢普(Bryan Shepp)的支持。就我个人而言,他对我个人事业的鼓励意义重大,是他令我感到自己是这个大的知识分子圈内的一员。在这方面及其他方面,他都是一位敏锐的、有见解的、我永远都敬重的大学主管的楷模。我也感谢他的继任者凯瑟琳·斯卜尔(Kathryn Spoehr),她为编辑本书的索引提供了宝贵的资助。

布朗大学的很多其他同事在本书漫长的孕育期里,也给了我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多尔·莱维(Dore Levy)对我在布朗所遇到的几乎任何可以想象出来的事情上,都给予了帮助;查里斯·米海文(Giles Mihaven)始终假装对我的专业一无所知,总是阅读我的文章并大加称赞;温戴尔·狄曲克(Wendell Dietrich)在我事业的紧要关头秘密地帮助我;杰瑞·葛瑞德(Jerry Grieder)和杰米·瑞恩(Jimmy Wrenn)总是能够雪中送炭;还有马

克·安诺(Mark Unno),我想我最终已经用庄子的中心哲学说服了这位对于远非他所处的时代的学术拥有宿慧的学者。这些年来,我把我不断在变化的思想,融入了一系列关于古代道家思想的本科生与研究生课程之中,我当然不能忘记这些年来布朗大学的几届学生所给予的宝贵的批评与回应。

从1997年春天我正式撰写此书开始,我就很少与我的家人谈话,与外界更是全无往来。但是,有几位学者主动地提供我他们已经完成但还没有出版的书稿。没有这些资料,我根本不能完成本书。他们之中,最主要的是夏德安(Don Harper),他把自己的代表作《古代中国医学文献》(*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的几个主要章节寄给我;还有李克(Allyn Rickett),他把同样是自己的代表作的《管子》英译本第二册的若干相关章节寄给了我。我也从白一平(William Baxter)关于《老子》语言的重要研究的文稿中获益匪浅。该文后来被收入孔丽维与拉法格编辑的文集。我对提供此稿的编辑表示感谢。

此书的初稿完成之后,几位学者曾进行了通读、评议。他们在书稿的思想、文法、组织和观点上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都已在成书时体现出来。我深深地感谢在他们繁忙的时间表中挤出时间、拨冗审稿的韩禄伯、桂思卓,还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稿人。我还要利用这一机会,感谢几位阅读了本书不同章节、并提出宝贵的改进建议的朋友与同事:鲍则岳、麦安迪、麦克·马丁(Michelle Martin)、安·哈特、安然·斯得纳克(Aaron Stalnaker)和李永(Jung Lee)。我的两位袍泽兄弟——老大哥葛瑞格·斯高鹏(Greg Schopen)、小老弟查尔斯·莱赫曼(Charles Lachman),总是在白天或夜晚的最奇怪的时间段里洗耳恭听我林林总总的奇怪想法。虽然我非常希望他们能为书中所有的缺陷承担责

任,并把所有的成绩归功于自己,但这既对他们不公平,也不符合学术规范。我更不想开这样一个学术先例来供人模仿,尤其是那些这些年来我也许已经对他们的论著提供了帮助的人!

哥伦比亚大学的出版团队委实堪称第一流。人文出版部的杰尼佛·库茹(Jennifer Crewe)最初鼓励并接受本书的出版,同时提供了一份我完全可以接受的出版合同。在本书出版的每一个阶段,她所表现出的完全的诚信,令我对出版事业重拾信心。感谢黛宝拉·索莱德(Debra Soled)编辑此书的细心与敏感。莱斯丽·克利索(Leslie Kriesel)以其技巧与灵活,满足了本书出版制作中各个方面的要求。自由职业者安妮·荷姆斯(Anne Holmes)将她的丰富的经验与渊博的知识,运用到了极有帮助的索引的编制之中。

最后,如果没有我妻子丽丝(Lis)不离不弃的相伴,以及我们的两个儿子查克(Zach)和嘎思(Gus)富于挑战性的奉献,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我因为写这本书或从事其他与本书有关的课题而不能待在丽丝身边的时候,她却永远在我需要的时候守着我。在我紧张的写作过程中,查克会拉着我看他的电影,或咨询一些他无法回答的政治与体育花边问题来让我休息,嘎思则永远是一个古代道家所仰慕的存有“童心”的那种浑然忘我的逍遥自然的例子。还有,我的弟弟米奇(Mitch)减免了我处理已故母亲房产的法律负担,让我可以更专心地从事本书的写作。对于这个非凡的家庭,我怀有无尽的感激。

罗浩(Harold D. Roth)

我的两位老师——查理·施普曼(Charles Lach-Schopman)和格雷格·施普曼(Greg Schopman)在白天黑夜的时间里,将里边的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完美。虽然格雷格和查理在书写的过程中,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我仍然感到,这本书的出版,完全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劳。

出版说明

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增大,长期以来中国仅仅依靠历史辉煌吸引世界目光的传统正在改变。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生机和发展潜力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研究的热点。目前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断升温趋热,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就需要了解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情况,中国文化要显示其世界文化的意义,也需要做好与西方学术界的交流和对话,展开沟通和互动。为此,我们陆续出版了《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目的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状况,加强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和沟通,以繁荣我们的学术研究。当然,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难免有隔靴搔痒的缺陷,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会造成旨趣相背的结论,文化视角的不同也会使他们有着不同于我们的观照和表述角度。故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出版者同意或赞同作者的内容和观点。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愿在此搭建一个开阔学术视野的平台,以希有更多的海外中国学著作问世,嘉惠学林。

(02)	游学馆《业内》	章三第
(02)	游学馆主《业内》	
(00)	游学馆《业内》	
(05)	游学馆《业内》	
(85)	游学馆《业内》	

目 录

中译本序	《业内》的中译本序	章四第
鸣谢	鸣谢	
(101)	鸣谢	
导论		(1)
文献革命		(1)
“文献考古学”		(4)
“神秘主义的阐释学”		(5)
《内业》的意义		(6)
“老庄”之外		(7)
(001)		
第一章 《内业》的文本		(14)
《内业》的文学风格		(15)
《管子》文集的性质与起源		(21)
《管子》成书		(24)
《内业》成文及作者		(29)
儒家《内业》?		(40)
第二章 《内业》的校本与翻译		(45)
《内业》的校勘本		(45)
专业术语		(53)

第三章 《内业》的学说	(59)
《内业》主题概览	(59)
《内业》的哲学基础	(60)
《内业》的内修实践	(70)
内修的整体益处	(82)
第四章 早期道家神秘主义语境中的《内业》	(89)
什么是神秘主义?	(91)
《内业》中的神秘主义	(102)
《内业》中的神秘修炼	(103)
《内业》中的神秘体验	(108)
《内业》中的神秘哲学	(112)
《内业》与《老子》	(115)
《内业》与《庄子》	(126)
内在修炼的入定诸阶段	(138)
内修与养生	(146)
第五章 早期道家语境中的《内业》	(153)
走向早期道家的定义	(154)
《内业》与早期道家	(184)
附录 《内业》校译	(193)
译后记	

导论

文献革命

20 世纪下半叶后段,一批长眠地下 2000 余年的、久佚的文献在中国相继出土。这些著于竹帛、葬于中国北部与中南部精英阶层的墓葬中的文献,包括了三类内容:(1)见存于传世文献的(而且是非常古老的)文献别本,如马王堆帛书《老子》;^①(2)不存于传世文献但见于史书或文献记载的书稿写本,如马王堆帛书《老子》所

① 马王堆是湖南省省会、中国中南部的主要城市长沙附近的一个小村子。1973 年一批文书发现于这里的一座公元前 168 年的墓葬,其中有《老子》的两种写本;《老子》又称《道德经》。有关这批发现的简介,以及这两种《老子》最早的英文翻译,请见韩禄伯:《老子道德经》(*Lao Tzu Te Tao Ching*) (纽约:白兰汀图书,1989 年)。“老子”在字面上,意思是姓“老”的“大师”。“子”是一个尊称,用于称呼那些重要的、其思想被编辑成书并以其名命名的老师,诸如《庄子》、《韩非子》、《荀子》和《淮南子》。然而,尽管其书名如此,许多古代文献乃是杂合编纂成书的,书中不只包括了书名所见大师的思想,而且也包括了以某种方式与其关联的其他作者的思想。即使《老子》仅托名于一人,它也有可能是一部作者不详的、早期道家师徒所编的韵文合集。

附、暂时被定作《黄帝四经》的四篇文献；^①(3)前所不知的文献，如马王堆所出土的大批的医学文献。^②其他意义几乎与马王堆所出相埒的文献，出土于河北定州、山东银雀山、湖北张家山和最近刚刚发掘的郭店。这些发现以及后来东亚与西方学者们所作的研究分析，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宗教、哲学与科学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有了革命性的认识。

这场革命的到来，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于这些文献本身的研究分析，而是因为这些文献中许多与传世文献有着突出的、重大的关联，而那些传世文献或是由于它们模糊的学术背景、或是由于它们被认为是后人改篡甚或是伪作，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些文献的主要代表是《吕氏春秋》、《淮南子》、《鹖冠子》以及本书所

① 有关的英文研究，见皮文睿(R. P. Peerenboom):《中国古代的法律与道德:黄老帛书》(*Law and Morality in Ancient China: The Silk Manuscripts of Huang - Lao*) (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2年)、雷敦和(Edmund Ryden):《黄帝四经》(*The Yellow Emperor's Four Canons*) (台北:利玛窦学院,1997年)。最新的校本,见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雷敦和:《黄帝四经》第273—430页(第431—479页是非常有价值的索引)。完整的英文翻译,见叶山:《经典佚籍五种:中国汉代的道、黄老与阴阳》(*Five Lost Classics: Tao, Huang - Lao, and Yin - yang in Han China*) (纽约:白兰汀图书,1997年)。虽然根据最新的分析,这四部马王堆有关黄帝的帛书能否被定为《汉书·艺文志》所列的《黄帝四经》仍多有争议,我还是从陈鼓应与雷敦和,在具有结论性意义的证据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建立起来之前,选用“黄帝四经”一名以从“称名之便”。有关称名的争议,见皮文睿书第7—9页、雷敦和书第1—3页。

② 有关这些文献的翻译与分析,见夏德安:《古代中国医学文献:马王堆医书》(*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伦敦:凯根·保罗国际公司,1998年)。我感谢夏德安教授赐寄该书的校样。